

医文物的保护与研究

叶启晓

医文物是指历史上与医药卫生活动相关的人类遗物。它们不仅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医药卫生活动发展过程的信息载体,还是人类医学研究的珍贵资料。中华民族的医药卫生活动在人类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人类步入文明时代以来至十七世纪前的数千年间,中华医学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始终都领先于世界。在漫长的中医发展过程中,先贤们创造发明和制作了无以计数的反映当时医药卫生活动水平的用具和物品,但大多数均销声匿迹于历史长河中,能够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这些幸存于世的医文物与人类其它文化遗存一样,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是中华医学发展的物证和中医学史的宝贵遗产。本文仅就医文物保护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及问题与对策谈些认识,以引起同道的关注与思考。

一、医文物保护研究工作历史与现状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医药卫生行为的起源比人类本身的历史更为久远。在人类还未从灵长类动物进化出来的阶段,具有动物属性的原始医药卫生行为就已经存在,这与生物的生存竞争本能有密切关系。但早期的医行为大都原始而简单,用具亦粗糙而难辨,且随取随用随弃,大多数用具不是专用,很难认定与保存。这个发展阶段大概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中期。当人类发展到晚期智人阶段以后,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医药卫生工具逐步被制造出来,这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能够有意识地制造简单的多用或专用工具。尤其旧石器晚期,随着人类渔猎采集活动范围的拓展,工具选择和加工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较小型尖状器和带刃石质工具以及骨角制工具的出现,使其用于

医药卫生活动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出现了比较典型的用于医疗的“砭石”和用动物骨骼制作的小骨针、骨锥等器物^①。小骨针和骨锥不仅医用也作它用,而砭石则专用于医。在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②、《战国策》^③、《山海经》^④、《黄帝内经》^⑤等典籍中对砭石的医用均有较详记载。这些典型的医用品虽然还不能算作人类最早的医用工具,但却是我们目前能够确认并有所保存的最早的与人类医药卫生活动相关的实物。此后,人类医药卫生活动愈渐升华,创造出一批又一批既有时代特征,又有民族特点的医药卫生工具用具或用品。这些历史上与医药卫生活动相关的人类遗物称之为医文物。

中医学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历代医文物种类繁多。在古代社会,医文物多为皇宫贵族所收藏使用,有些则散布民间。对医文物的保护与研究,明以前还未见记载。明清时期医家对医文物的研究散见于他们的著述中^{⑥·⑦·⑧}。然而,对历代医药卫生文物进行有组织有目的地征集、收藏、保护与研究工作开始于民国初年。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敲开了中华古国的大门,西学东渐的浪头亦咄咄逼人,国内则泛起一股民族虚无主义思潮。1913年,美国人加里逊(F. H. Garrison)出版了一部世界医学史专著《HISTORY OF MEDICINE》。在这部近700页的著作中,对西方国家的医学历史和成就作了精彩的论述,但对东方国家的医学历史却轻描淡写,而写到中国的医学时尚仅半页,还谬误迭出。这深深地触动了中国医学家的民族自尊心,同时也激发了弘扬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研究宣传中华医学历史与成就的激情。首先是1914年医史学家陈邦贤提议成立中国医史研究会(虽然得到一部分学者的支持和响应但因多种因素而未成功)。稍后,王吉民、伍连德等医学家怀着“保存国粹,矫正外论”的思想,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广泛征集和收藏研究国医史文献与文物;经十数年努力,他们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华医学历史与成就的论文和《中国医学史》等专著,并在1937年4月于中华医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之际,为会议筹办了“医史文献(文物)展览会”。这次展览共展出医文物、医文献2000余件,种类包括中医制药工具,药瓶、针灸针具和外科工具,中医古籍善本、抄本,医家传记和医事画等,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举办的以医文物文献为主题的大型陈展活动,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此后又经一年多努力,1938年7月王氏等医史界同仁在上海池浜路41号

① 傅维康:《中国医学史》,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②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五十二病方》:“燔小隋石,淬醢中以熨。”

③ 《战国策·秦策注》:“石针曰砭。”

④ 《山海经·东山经》:“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郭璞注:“可以为砭针,治痈肿者。”

⑤ 《黄帝内经·灵枢·玉版》:“故其已成脓血者,其惟砭石铍针之所取也。”

⑥ 明正统八年(1443年):太医院复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⑦ 明正德八年(1513年):李廉著《医史》。

⑧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赵学敏编:《申雅外编》、《申雅内编》。

中华医学会图书馆的石库门院落中辟建了中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中华医学文物文献,展示宣传中华医学文化的场所——上海医史博物馆。该博物馆的成立是一个里程碑,它拉开了现代意义上有组织地对医文物进行专门收藏保护、研究与展示工作的序幕,使这项工作由无序发展的个人行为变为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事业。

自1938年7月至2003年的65年间,医文物收藏保护与研究工作不断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8年7月至1949年建国前。这时期的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国家处于战争年代,医文物的保护与研究处在一种复杂曲折的社会环境中,虽发展较快但受到多方因素限制,举步维艰,发展不均衡,主要收藏研究中心在上海,全国医史博物馆仅上海一家;二是收藏保护行为还不是政府行为,而是医学社团组织的行为,文物的所有权也属于社团组织所有,文物的研究与保护工作有一定随意性;三是这一时期的战乱和经济萧条,便于有识之士在民间收集珍贵医文物,上海医史博物馆在这一时期入藏的医文物大部分是珍品。第二时期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这个时期医文物的保护与研究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首先是原属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所藏之医文物的权属性质由旧社团所有转变为国有;另外是医史类博物馆得到发展,其中上海医史博物馆不仅对外开放,而且成为当时与上海博物馆等并列的上海市四大博物馆之一,其医文物的收藏活动也得到上海市文化部门和陕西省文物部门等的支持,许多珍贵医文物得以调拨征集成为馆藏,并仍然是全国医文物收藏保护与研究的中心。同时,随着全国各地中医院校的建立和中医教学工作的需要,北京,广州,陕西,云南等中医院校开始有目的收藏展示医文物,成立了规模不一的陈列室或中药标本室;1950年在全国卫生展览会上,医史部分展出了由全国各相关单位汇集的一批医史文物,为后来中国医史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此外,随着各大中医药企业的发展,保存和收藏医文物也成为时尚。第三个时期是文革期间。医文物的收藏保护与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医史博物馆被迫关闭,医史工作者遭到迫害,医文物收藏保护与研究宣传事业处于低潮,一些医文物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第四个时期是文革后至今。医文物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又开始出现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一方面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原有医史博物馆的收藏展示保护研究活动得到恢复与发展,使医文物的收藏数量和质量不断扩大和提高,文物展示与保护的基本设施也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是一批具有收藏保护和研究展示功能的中医药类博物馆,陈列室陆续出现在上海、广东、吉林、成都、山东、甘肃、湖南、南京、北京、江西等省市的中医院校、中医药科研单位和中医药企业中,成为收藏保护与研究医文物,弘扬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机构;此外,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批具有纪念和保护性质的中医名人纪念馆、中医圣迹遗址或遗址博物馆也不断出现,如河南南阳的张仲景医圣祠,陕西耀县药王山,孙家堀的孙思邈纪念馆,湖北蕲春李时珍纪念馆,以及陈实功、万全、皇甫谧、扁鹊、吴尚先等古代医家的医迹遗址和纪念馆,西藏的药王山,青海塔尔寺的门扎伦(医学校),内蒙古的三镇医学旧址等。这些医文物收藏单位不仅收藏保护了一大批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中医药卫生文物,也为中医药卫生科

研活动积累了宝贵资料；同时，活跃了中医药卫生教学和科研活动，促进了医文物的研究。这一时期医文物和医史研究气氛也较浓郁，许多相关论文陆续发表，特别是《马王堆医书考释》，《龙门药方》、《中国医学通史》和《中华医学文物图集》等专著的问世，有力地带动了医药卫生文物和相关领域的研究。

据粗略估计，迄今国内较固定的医文物收藏单位有六十余家，收藏医文物 20—30 万件，其中仅上海医史博物馆收藏的医文物就有一万四千余件。这些医文物在收藏单位大多得到基本保护和管理。

二、医文物保护研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尽管医文物的收藏保护与研究在六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目前的工作现状仍不容乐观。就总体而言^①，存在下列主要问题：一是医文物收藏单位的建立缺乏科学性和理论指导，更无宏观规划，完全处在一个无序的发展状态中。全国各类医文物博物馆、纪念馆，医圣迹遗址等的开办与建立随意性强，有很多机构内容雷同，形式重复，特色不鲜明，布局不合理，有些确是为满足直观教学的需要，有些则是照搬克隆，馆内没几件藏品，根本称不上是博物馆。各文物收藏单位人员结构大多不合理，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缺乏文博专业骨干，因而医文物收藏保护工作受到限制。二是文物收藏与管理工作水平较低。各单位的文物收藏管理制度大多不健全，藏品的账目设置和数目统计不规范，文物卡片记录项目不完整；大多单位的文物没有经过专门鉴定，藏品的建档工作基本没有开展或严重滞后，这使医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的工作层面长期限定在一个较低的层次里，难于提高。三是医文物保护工作没有得到相应重视。大多数单位只是对医文物进行展览利用，而常常忽视对医文物的保护，许多藏品因过度展用，又缺乏必要的保护措施而遭到严重损害；文物库房中的藏品亦常因保护措施不当，而遭受霉菌细菌侵害，或其它自然与人为因素的损害，其状令人痛心。四是医文物征集工作受到多方面的制约而步履艰难。这里一方面是认识问题，另一方面是资金问题，还有对医文物的价值与真伪的辨别问题，因而有很多散在民间一纵即逝的珍品没能得到征集与保护。五是在医文物保护与研究过程中，缺乏宏观的整体的长远的考虑，在处理医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时，往往只顾及眼前或短期效果，而忽视长远利益；在医文物的研究中，往往偏重具体的微观的局部的研究，而忽视整体的宏观的全面的深入系统研究；因而在重视程度上出现了对汉医药卫生文物保护与研究的重视程度相对较重，而对少数民族医文物的保护研究的重视程度相对较轻。在医文物的数量分布特点上，出现了“三多三少”现象：即从收藏的医文物的民族属性上看，汉医药文物多，少数民族医药文物少；从收

^① 参见吴鸿洲、叶启晓、俞宝英等：《国家重点医药卫生文物征集调研保护》科研项目上海结题报告。

藏的医文物时代上来看,明清以来的文物多,而唐宋及其以前的文物少;从收藏的医文物的来源上来看,传世文物多,出土文物少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医文物保护与研究工作的进展,长此以往,医文物的保护与研究将误入歧途,祖国优秀的中医药传统文化遗产将面临难以挽回的危害甚至摧残。这不仅是文物保护工作者所难以面对的情景,也是中医界和医史界同仁所难以面对的。我们应认真思考,采取措施,竭尽全力逐步改变或改善这种状况。

三、医文物保护研究工作的对策思考

医文物的保护与研究,是人类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重要方面,医文物工作是文物工作的一部分。因此,这项工作只有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指导方针,结合和遵循医科学医文化的内在规律性与特点,在充分分析研究事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因势利导,才能使之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首先,应在国家相关科研院所或基础好的高校医文物研究机构设立专项研究课题,脚踏实地地对全国医文物保护与研究现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适合我国医文物保护与研究事业发展的宏观规划和指导思想,并设立相应的协调指导机构,对全国医文物博物馆进行统筹规划和综合指导,变目前医文物机构无序盲目发展为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有计划有序地发展,使全国医文化博物馆形成一个不同层次,各具特色,内容涉及医文化方方面面,同时又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科学系统,以满足医文物保护与研究及教学的需要和社会各界对普及医文化的需求。

其次,要引导现有医文物博物馆和各类医文物收藏展示机构进行调整和充实,优化人员结构,吸引专业人才,特别是文博专业人才,强化文物基础工作考核和管理,扎扎实实提高工作水平,逐步减轻和杜绝医文物的自然与人为损害。使每个医文物单位都成为内部各项保护措施和制度健全,管理工作科学规范,既收藏研究宣传医文物,又能有效地保护文物的医文物保护研究工作实体。

再次,应着手建立有医史医文物专家和文博考古专家组成的医文物鉴定组织,迅速及时地为各医文物收藏单位进行文物鉴定,划分医文物等级,使不同的医文物得到不同的养护,重要医文物得以珍藏并发挥作用。

再次,要加强对医文物征集与保护工作的认识,创造条件,征集和保护那些散在民间或社会各部门中的珍贵医文物,包括流散于国外的医文物珍品,注意征集少数民族医文物和外国传统医文物以及相关的西方医文物,把更多的医文物收藏在有相应资质的医文物保护机构中,使它们得到有效保护。

在医文物的保护研究过程中,应摆正汉医学与少数民族医学的关系,加强对少数民族医文物征集整理和保护研究的工作力度,提高少数民族医文物的收藏比例,使之真正成为祖国医文物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在弘扬和继承祖国优秀医文化传统中发挥

积极作用。同时,注意处理好医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将当前效益与长远效益相结合,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统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兼顾,使我国医文物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在宏观上,应建立一个布局合理,内容充实,功能完备,即相互联系相互借鉴,又各具特色,互为补充的医文物保护研究与宣传展示单位的工作网络体系;这个体系应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医文化科学逻辑的有层次的系统,是以国家中医药科研机构 and 中医药高等院校医史博物馆为龙头,以国内大中型中医药企业和社会自发创办的医文物收藏机构为骨干,以地方社区或民间创办的医类博物馆、纪念馆、纪念地和医迹圣地遗迹等为辅助的医文物保护研究系统。我们期待着医文物保护与研究事业的发展,期待着祖国宝贵的医文物得到永续保护和珍藏,更期待着祖国优秀的医文化传统得到继承和弘扬。

(作者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